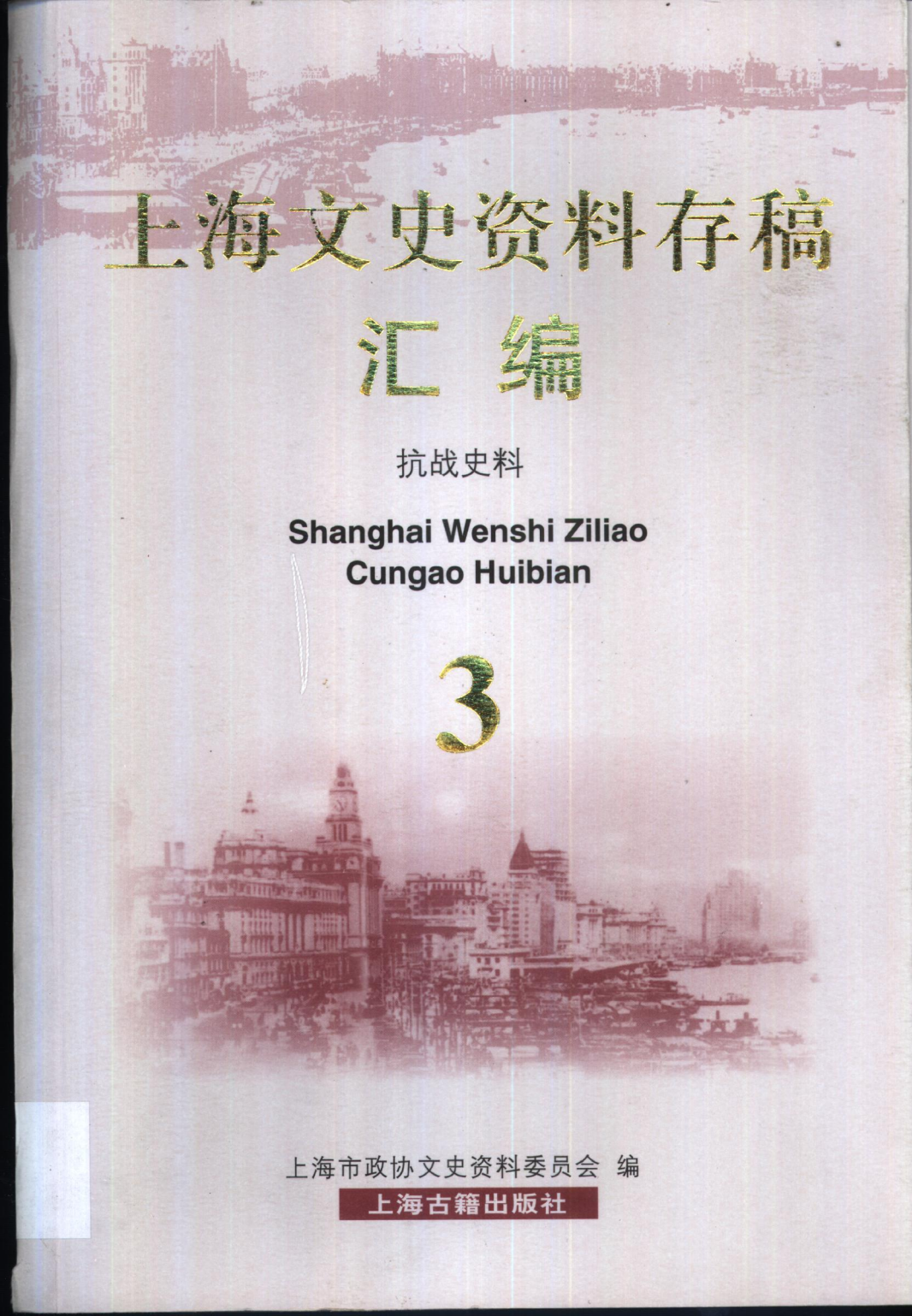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 汇编

抗战史料

Shanghai Wenshi Ziliao
Cungao Huibian

3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00
K295.1

S316

3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 汇 编

抗战史料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第四十七师参加一·二八上海抗日的经过	赵子立 / 1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上海市民义勇军	方知达 / 10
嘉定沦陷后的日军暴行	姚旭参 / 24
朝鲜志士行刺日本侵略者白川等的义举	李华林 / 33
徐哲东教授的几篇关于淞沪抗日的遗作	刘同葆 / 38
“十九路军抗日战绩展览会”记实	金长琨 / 44
第二师补充旅参加淞沪抗战回忆	傅立贤 王大中 / 46
八一三淞沪战役中我的经历	陆大公 / 50
八一三杨树浦江湾地区战况	熊新民 / 56
第七十四军上海抗战概述	吴 莺 王仲模 / 66
化学兵总队淞沪抗日始末记	戴 威 / 78
随六十一师参加淞沪会战	邓禹恒 / 84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上海抗日作战经过	吴幼元 / 91

七十八师淞沪抗战记述	李汇川 / 99
第九师在上海战场和溃退到芜湖见闻	王惜时 解云祥 / 104
王子隆抗击日军	奉贤县胡桥乡编志组 / 108
向四行仓库孤军送旗	叶春年 / 111
记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胡兰畦 / 114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前前后后	高恩铭 / 119
回忆抗战时在上海办理救济被难同乡	韩希愈 / 126
淞沪抗战时期主持浙江重伤医院的回忆	褚承猷 / 134
在宁波迎送上海抗日伤病员的日子	戴庆琦 / 138
中法学堂学生的爱国行动	金长琨 / 142
抗日爱国将军傅作义的一席话	赵彦和 / 145
上海地方协会的回忆	黎照寰 / 147
抗战时期的上海电信	李 桐 / 156
淞沪支队第六中队在朱家圈反击日军	金桥荣 / 161
输送人员和物资去抗日根据地	沈 诒 / 164
我在上海孤岛从事的抗日救亡工作	姚惠泉 / 167
策反邵式军	冯正武 / 177
郝自修拳师兄弟殉难茸城事略	李剑农 / 188
日本宪兵司令部对我的迫害	李 桐 / 191
我被日伪特务枪击受伤的经过	顾执中 / 195
上海日狱两月半	张冰独 / 202
中国银行行员被害纪实	侯 湘 / 212
上海司法界的两起血案	蒋晓光 林达祖 沈立行 / 221

日伪统治下的奉贤	朱声昌 / 227
敌伪接收上海租界国民党法院前后	赵德仁 / 253
新闻界抗日战士朱惺公	虞韶成 / 262
爱国实业家方液仙及其殉难经过	方之雄 / 268
军统在汪伪政权内的地下特务组织	杨 实 / 273
一个敌伪不干预的无线电台	陆鸿勋 / 277
抗战后期国民党上海地下总部	吴仁勋 / 291
回忆汪伪前后三五事	胡泽吾 / 299
敌伪时代的“中华留日同学会”	周逸峰 / 311
汪伪上海市汉奸组织内幕	杨今农 / 320
“七十六号”魔窟罪恶点滴	薛珩莘 / 330
“黄道会”罪恶活动片断	何国涛 / 334
汉奸张北生投敌卖友始末记	石顺渊 / 348
李士群与《国民新闻》报社 ... 蒋晓光 林达祖	沈立行 / 356
日军毒杀李士群真相	袁愈佳 / 365
梅思平其人	叶风虎 / 373
上海沪西工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斗争	顾松盛 / 393
目击日军投降	邹若军 / 397
在日本帝国银行为解散费的斗争	周良泉 / 404
国民党海军接收上海方面日伪物资之史料	许季超 / 408
上海的逆产处理情况	杨 实 / 419
我所知道的姜公美	张德铭 / 428

第四十七师参加一·二八 上海抗日的经过

赵子立

1931 年秋,第九军在江西参加第三次“围剿”惨败后,第四十七师与第五十四师合编,有枪的编为第五十四师,仍留江西作战,没枪的编为第四十七师,开赴蚌埠补充训练了 3 个多月。到翌年 1 月,发生一·二八事变,在表面上,第四十七师是蒋介石命令开赴上海抗日的,但第九军军长兼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先是按兵不动,迟迟其行;继则徘徊瞻顾,滞留中途。等第四十七师磨蹭到达上海时,战事已中止。

第五十四师在江西永丰,将徒手兵编成第四十七师第二旅(辖第三、第四两团),向蚌埠开拔。当时旅长是王育德,旅参谋主任是赵子立,第三团团团长是赵××,第四团团团长是刘秉诚。1931 年九十月间到达蚌埠,上官云相让第三、第四团合编成第四团,另由第四十七师的部队编成一个第三团,以上官云相的亲

信李锡庆为团长,塞进第二旅来。王育德只好把第三团团长赵××调至旅部任参谋主任,刘秉诚仍任第四团团长,我被调任第四团任中校团附,以曹雷雨为第一营营长,李文奎为第二营营长,霍炳文为第三营营长。这样,就把第五十四师的干部挤掉了一半。

当第四团编好后,上官云相亲自点了一次名。在点名中有一名士兵,因为应名松懈,上官云相立时故意大怒说:“本军长点名,竟敢这样放肆,目无长官,足证在家也不是好人。”说罢叫刘团长立时把那个士兵枪毙了。为什么这样一点小事,也值得写在这里呢?军阀杀一个兵,本来是平常事,但是,因为应名时态度松懈,就要杀人,这在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上官云相的目的,不是在杀那个兵,而是“杀鸡给猴子看”,要把第五十四师调到第四十七师的部队,镇压得什么话都不敢说,任由他来摆布。当时,第二旅旅长王育德,第四团团长刘秉诚在上官云相的淫威下,也不敢说什么,只好把那个士兵枪毙了。

第二旅旅长王育德,上受上官云相的压迫,下受李锡庆的欺凌,只好辞职不干。王育德对我很好,我对王育德也很好。我当时曾建议他说:“我们名义上是第四十七师的一个旅,实际上仍是第五十四师的一个旅,不能容许别人任意来欺侮我们。我们应当把上官云相排挤我们的情形,报告郝师长,并直接报告蒋委员长。郭华宗等敢反对他,我们就不敢反对他。”王育德不接受说:“我不干算了。”这样,王育德走了。接着,上官云相就让李锡庆当旅长,李锡庆把旅部原第五十四师的干部全部换光。

王育德离开第四十七师后,由第五十四师来第四十七师的干部,就数第四团团长刘秉诚是个头了。这个人当时 30 多岁,

河北雄县人，河北某师范学校和保定军校九期毕业生，国学和兵学程度都不错。他和王育德一样，也是懦弱怕事的人。但他比王滑头，王应付不了的环境，他能卑躬屈节，委曲求全地应付下去。后来我和他处得不太好。

第四十七师整编后，蒋介石给他补充了武器，同时开始训练。第四团的补充，得不到公平的待遇，武器较之其他各团少而差。第四十七师的训练，较我参加过的任何部队都为呆板，还保留了孙传芳五省联军的传统习惯，不注重战斗教练，只注重制式教练，只会在操场上摔脚底板——走各种步法。

第四十七师在蚌埠摔了三四个月脚底板，到翌年——1932年1月，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于2月初，受命开赴上海参加抗日。

上官云相一接到开赴上海抗日的命令，就向国民党中央报告说，第四十七师由江西开来蚌埠后，虽然补充了一部分武器，但器材补充极少。按编制全师尚缺这样那样的武器若干，这样那样的器材若干，请速发给，以利作战。他就这样利用向南京领发武器、器材来拖延时间。

他让各部队慢腾腾地于蚌埠上火车，在向南京去的途中，沿途各站开车的时间，路方要听从军方的决定。他让各部队控制时间，大站也停，小站也停，能慢就慢，借以逃避作战。

第四十七师到达浦口后，受命经溧水、溧阳、无锡、苏州开赴上海附近地区。当我随部队渡江至下关时，看到当时国民党军政部交通司司长邱伟。他是我在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六期工兵第三队（学通信）肄业时的科长。当时我因为第四十七师发给第四团的通信器材太少，想向邱伟要点通信器材。于是我就去下关

车站大楼上津浦铁路管理局见邱伟说：“我是中央军校六期工兵三队的学生赵子立，现在第四十七师第四团任中校团副。第四十七师开赴上海去抗日，团里没有通信器材，怎么打仗呢？请老师发给我们一点。”他很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干得很好，你们六期现在当中校的还不多，你要继续努力，多给国家做点事情。你要多少通信器材，我批给你，你开个单子来。”于是我就按一个团应需的和应预备的开了一个单子，他批“立即照发，以应亟需。”我到南京城内领出，交给第四团团长刘秉诚。刘向第二旅旅长李锡庆报告此事，李说：“将器材交旅部，由旅部分配。”我当时说：“这是我个人要的，第四团器材少，请仍归第四团用。”但李锡庆说：“这是用第四十七师的名义要的，应当统一分配。”

第四十七师由南京改为徒步行军，其前进速度更可由上官云相来控制了。当时，上海的仗打得很激烈，但我们每天走上三五十里，就要宿营。所到之处，调戏妇女，窃取财物之事时常发生。上官云相等高级干部，都不跟部队行动，先乘火车至苏州，在那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当第四十七师到达苏州附近时，受命归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指挥。这时第四十七师的原3个团，都走在后面，让从第五十四师来的第四团走在先头，过昆山后，又派我先至第十九路军总部联络。我沿铁路经安亭向东走。在途中，我见到战地难民沿铁路及其以北地区向西走，时有日机沿铁路低飞扫射并轰炸。我到南翔地区，找到了第十九路军总部，先到参谋处接头。这时我概略地了解到以下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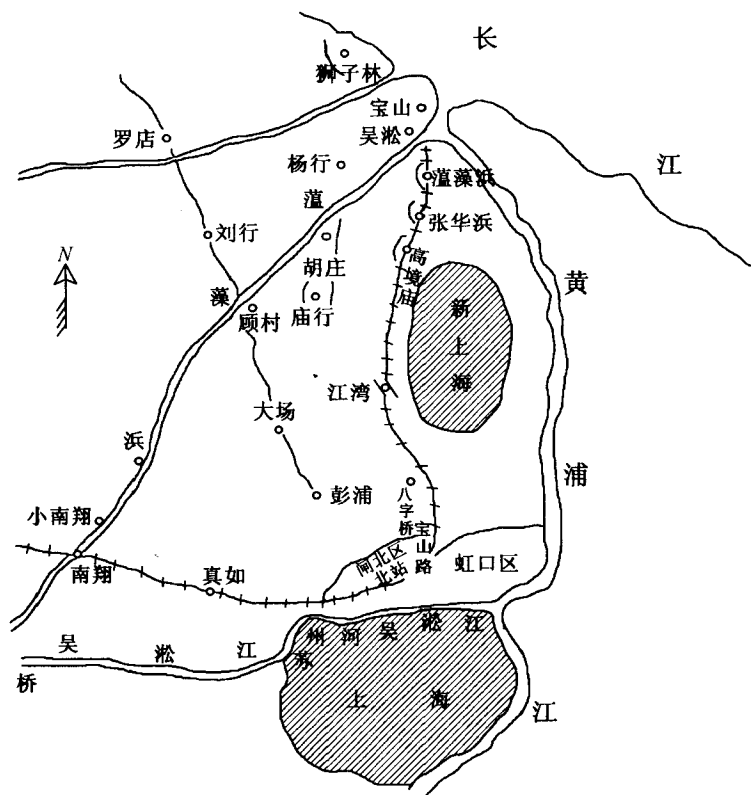
日军于1932年1月28日晚，自虹口地区向上海北火车站、宝山路一带发动进攻，企图于24小时内占领整个上海。十九路

军在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协助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把日军撵下了黄浦江,粉碎了日军一举攻占上海的狂妄企图。于是,日军在2月上旬增兵,仍向虹口以北的八字桥地区猛攻,经我军民英勇抗击,日军又遭到第二次失败。日军在2月中旬再次增兵,从黄浦江口及其以南的西岸登陆,占领蕴藻浜、张华浜、高境庙地区,其主力在海空军协同下,向江湾——庙行——胡庄一线猛攻,将攻击的重点放在庙行地区;另有部队,渡过蕴藻浜向吴淞、宝山、狮子林进军,包围我守军。但我守军被围不屈,坚持战斗。日军向江湾——庙行——胡庄进攻的部队,经我军民英勇抗击,又遭到第三次失败。日军不得不在3月上旬第三次增兵,并以白川大将为上海侵略军主帅。当我到十九路军联络时,日军第三次援军的运输船,尚在长江口外三夹水区游弋,其企图登陆的地点和战略意图不明。

当我至十九路军总部联络时,上海守军占领北站——宝山路西段——八字桥——江湾——庙行——胡庄一线与日军作战,第七十八师在吴淞、宝山、狮子林被敌包围,但仍坚持战斗。

我与十九路军总部参谋处接洽后,晋见了蒋光鼐总指挥。他询问了第四十七师的编制和人数以及当时到达的位置,我如实作了回答。他指示我转告上官云相让第四十七师开到南翔附近待命。当我退出后,他又第二次把我找回去,一面说“给你们些慰劳金”,一面提笔写了一张“支第四十七师洋8000元(记不太准)”的条子给我。

我回到第四团,将联络经过、所得情况和蒋光鼐的指示,通过团长刘秉诚报告了旅部,并将8000元的条子,也交旅部转师部。这时团长刘秉诚秘密地告诉我说:“我们由南京经溧阳——无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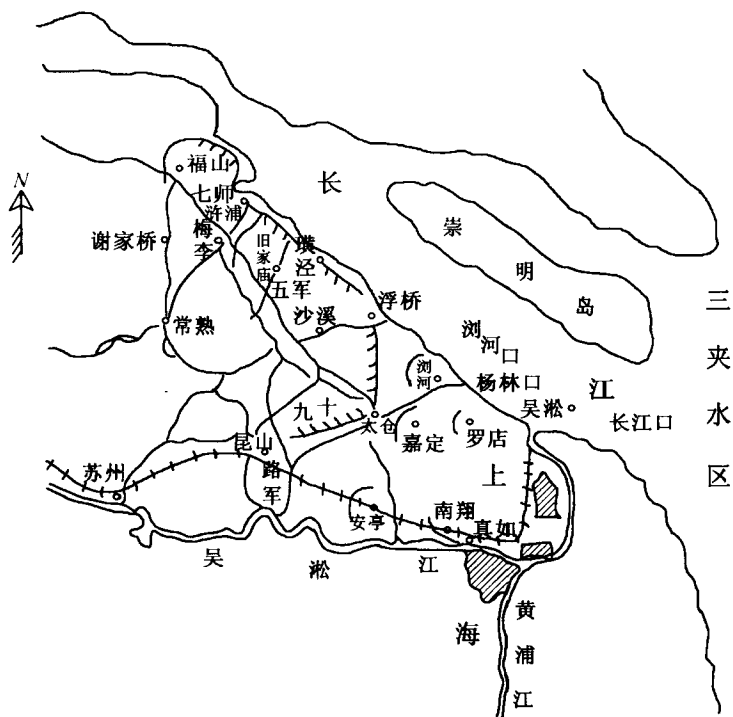
锡——苏州至昆山，沿途仅日机侦察，并无轰炸。但师部谎报多次受到日机扫射和轰炸，伤亡很大，企图逃避或延缓参加作战。”同时我看到苏州、昆山地方的小报登载：“由南京开来向上海参加抗日的□□□□师徘徊中途，畏缩不前，并且纪律废弛，到处扰民……。”当时，苏昆地区部队的高级长官的姓名，只有“上官云相”是四个字，小报上画的四个框框，很清楚说的是第四十七师。

第四十七师到达昆山地区后，因形势关系，并没有继续向南翔前进，在那里停了很短时间，就听说日军的第三次增援部队在浏河口方面的杨林口登陆了。日军在杨林口登陆的时间是3月下旬。当日军登陆时，杨林口并无正规部队担任防守，仅有地方保安部队的一个排驻在那里。日军一部毫不费力地登陆后，就在那里占领了一个滩头阵地，掩护大部队上岸，企图进攻上海守军后方。

日军在杨林口登陆，嘉定、太仓方面无部队据守，上海守军将腹背受敌，遭到严重威胁，不得不放弃上海，向西撤退。十九路军撤退时，将斗笠留置在阵地上，原对阵的日军与杨林口的登陆部队，望见斗笠，一连三日，不敢前进。迄确认中国军队已放弃阵地后，才开始进占浏河、嘉定、南翔、安亭等地区。

我军放弃上海后的部署概略如下：十九路右翼依托吴淞江，担任昆山至太仓地区沪宁路正面的守备，第五军担任太仓东北地区和常熟以东江防的守备，第四十七师担任常熟东北浒浦至福山地区的江防守备。

第四十七师于4月初到达福山、浒浦地区。当时采取间接配备，以一部扼江岸构筑工事，主力置于福山、谢家桥、梅李地区，并沿福山至梅李构筑纵深的预备阵地。第四十七师一到达



图二

指定防区时,尚有对敌观念,加紧构筑工事;但不久由于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和谈日趋接近,就连工事也不愿构筑了。许多高级干部有的嫖,有的赌,有的抽(大烟),有的纳妾讨小。如第二旅旅长李锡庆将他新讨的苏州姨太太(由上官云相的一个姓易的苏州小老婆介绍的)接到前方去。他们每日吃喝玩乐,任意挥霍,反正第四十七师是包干制,士兵的薪饷,他们高兴给,就任意给几个,不高兴给就全部花了也没啥。这且不说,他们连十九路军蒋光鼐总指挥给的几千元慰劳金,也不向下发。我忍不住了,提出了质问,他们说:“军政部扣了。”蒋总指挥明明对我说是慰劳金,又不是十九路军代军政部垫发的经费,军政部怎能扣呢?他们硬不发,不得不拿这话来搪塞我的质问。尤其可耻可笑的是,上官云相为了想同化第五十四师拨到第四十七师的第四团,竟把他的两个使女丫头给第四团的两个连长做老婆(后来又把两个连长提升为营长)。他们荒淫无耻,卑鄙龌龊,怕抗日,怕牺牲,虚报情况欺骗国人。这就是第四十七师参加上海一·二八抗战的真相。

至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上海停战协定,答应中国不在上海驻兵。该协定签字后不久,第四十七师即由长江乘轮船开赴鄂东的武穴(今改为广济),准备续开豫鄂皖边区的反共反人民的战争。

(1965年)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 上海市民义勇军

方知达

在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中,有一支人民武装,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组织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协助十九路军,奋战于扬子江和黄浦江口的宝山县沿海地区。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却机智、勇敢,将强大的日本战舰和登陆部队,拒之于十里海滩之外,固守住阵地,使日军始终不能登岸,最后败退而去。这支人民武装,就是当年的“上海市民义勇军”。我在少年时参加了这支武装,经历了从成立、训练、作战,直至被国民党政府勒令解散的全部过程。现就亲身见闻,追记如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各界人士义愤填膺,由上海市商会、上海市民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出面,成立了“上海抗日救国会”等爱国组织。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但蒋介石

却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日本侵占东三省事件,全国民众应“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即等待帝国主义列强来宰割中国)。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罢工、罢市、罢课,抵制仇货,集会、游行等抗日活动汹涌澎湃。上海抗日救国会成立了“救国义勇军委员会”,全市工厂、商店、学校、街道的有志之士踊跃参加义勇军的业余训练,并曾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检阅宣誓。我那时在虹口舟山路胜达呢绒厂当学徒工,时年 15 岁,是参加义勇军业余训练的队员之一。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抗日救国会的义勇军委员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公推该会负责人王屏南律师等 3 人,持公函至十九路军军部蔡廷锴军长处,请缨杀敌。蔡军长介绍他们到正在闸北前线对敌激战的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处接洽。翁旅长指定丘国珍参谋主任和丘秋星副官主任为上海市民义勇军觅一集合地点。于是,上海市民义勇军委员会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志愿参加上前线抗日杀敌者,速到南京路西藏路口新世界国货商场内报到,我即应召前往。至 2 月 1 日先后约有 200 人来参加,随即分赴闸北平江公所待编。丘参谋主任认为,义勇军虽然经过去冬短时期的业余军事训练,但未经实习作战,不便开赴前线,故决定先到大场进行实地训练。于是已报到的人员编队开赴大场,但在行进途中与日军遭遇,队伍被打乱冲散,到达大场宝华寺驻地时,只剩下 50 来人了。尔后又来了不少志士,至 2 月 4 日,已达 240 余名,即由一五六旅司令部发给步枪 64 支,子弹 12000 发,正式成立上海市民义勇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王屏南,第一连连长李楷,第二连连长王海清,其余编为补充排。这些队员多数是青年工人,其次为店员、学生,也有个